

南方地区出土宋元时期瓷器的团花纹饰研究

李 鑫 石牧阳¹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河南洛阳 471000）

【内容提要】：团花是中国古代纺织品的常用纹饰，到南宋以后成为某类纹饰的固定称谓。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团花在宋元时期不仅出现在纺织品上，也被广泛装饰在瓷器上，这一时期南方越窑出现了唐式风格的团花，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出现大批仿耀州窑团菊纹的瓷器。瓷器团花纹饰的兴衰反映了宋元时期南北瓷文化交流和瓷器胎装饰工艺的兴盛衰落。

【关键词】：宋 元 南方地区 瓷器 团花 纹饰

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一、历史文献中所见的团花

“团花”从字义即可见是一种圆形的纹样，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晚唐时期，晚唐曾有诗词描述“团花骏马娇行”。此处的团花可能指骏马佩戴的扎好的一团花束，与后世我们认为装饰在服饰、器物上的纹样概念完全不同。南宋时期诗人刘过在《沁园春·玉带猩袍》中遥想唐代郭令公“细柳营开，团花袍窄”的模样。此时团花确定成为服饰上的装饰纹样。到了元明清时期，团花在服饰上的运用更为广泛，变成了低等级官吏、命妇礼服上的规定纹样。《元史·礼乐志》记载：“伞一，中道。椅左，踏右。执人，皂巾，大团花绯锦袄，金涂铜束带。”^[1]《元史·舆服志》记载：“携金盆二人由左，负金椅二人由右。服紫罗团花窄袖衫。”^[2]《明史·舆服志》记载：“八品、九品官命妇冠服的褙子上绣摘枝团花。”^[3]如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元代壁画中，最右边的执扇侍从着圆领袍，胸前、下摆、两肩处各有一个圆形的适合纹饰，很有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元代团花纹服饰（图一）^[4]。

¹ 收稿日期 2022-03-29

作者简介 李 鑫（1980—），男，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

石牧阳（1993—），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宋元明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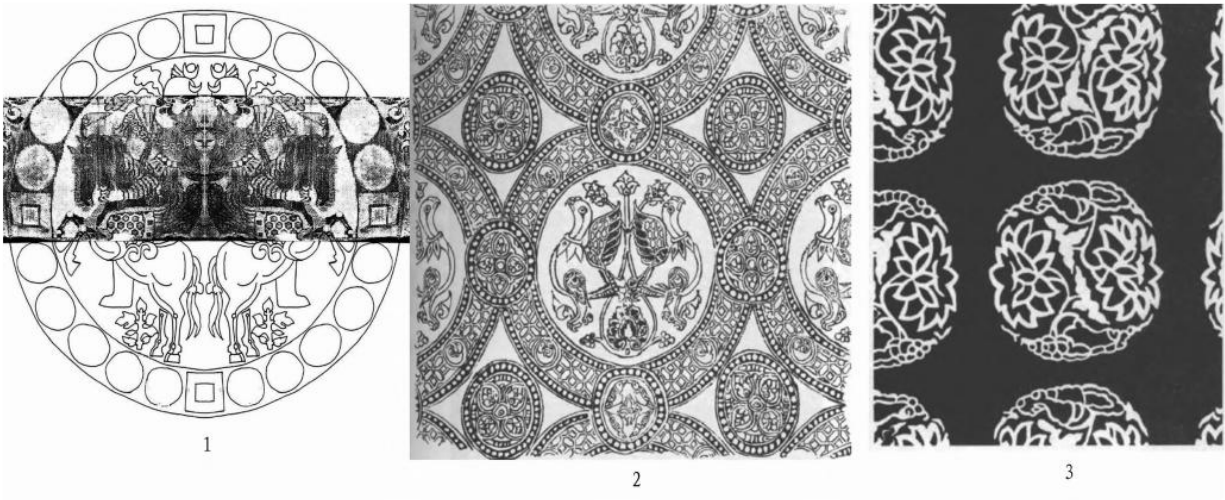


图一// 元代壁画中元代服饰所见团花纹

花卉、动物元素团成的圆形纹饰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运用到服饰上，但当时官方记载的名字应为“窠”“团窠”，为高等级官员、女性使用的纹饰，《新唐书》记载了唐代地方上供的纺织品有“两窠绫”“独窠绫”的样式^[5]；同时也记载了不同品级官员官服的纹饰，如“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6]、“亲王及三品、二王后，服大科绫罗”“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7]，此处“科”通“窠”^[8]。《宋史》也曾记载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年），女性锦背、绣背上的“稀花团窠”纹样^[9]。南宋诗人陆游也曾写道：“闲将西蜀团窠锦，自背南唐落墨花。”

“窠”这种纹样既然被称为“团窠”，必定是一种圆形纹样，从现有唐宋服饰上的圆形图案可见，“窠”最有可能是两类纹饰。一种是现在称为“联珠纹”的纹饰，即联珠组成的圆形边框内加入鸟兽等形成组合纹饰。从“窠”的字义来看，有框格的含义，如擘窠大字。圆形联珠框内的纹饰称为“团窠”也较为合理，且这类纹饰绚烂华丽，符合贵族身份。如新疆阿斯塔那墓地 TAM337 号墓出土的唐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联珠翼马人物纹锦（图二：1）^[10]；到宋代联珠纹变为球路纹，如新疆出土的北宋球路双鸟纹织锦（图二：2）^[11]。另一种可能为“窠”的圆形纹饰是圆圆的花朵纹。“窠”作为唐代官员袍服上的限定纹饰，虽然在目前发现的众多唐代壁画官员像中未见能对应品级的团窠袍服，但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各国王子服饰上能见到平铺盛开的圆形花朵纹（图三：1、2）^[12]，且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此类圆形花朵纹也常出现在年轻贵族以及侍从服饰上（图三：3）^[13]，如

榆林窟第 19 窟五代节度使曹议金孙辈曹延禄服饰上的纹饰（图三：4）^[14]。北宋时期也有类似的圆形花朵纹纺织品，如新疆若羌县阿拉尔墓葬出土的北宋藏青地垂莲团花纹锦（图二：3）^[16]已是两朵花聚合成圆形。此后元代出现了大量多元素聚合而成的圆形纹饰，并逐渐发展成了明清的团花纹。



图二// 纺织品上的圆形纹样
1.唐代联珠翼马人物纹锦 2.北宋球路双鸟纹织锦 3.北宋藏青地垂莲团花纹锦

因文献中无具体描述也无图例参考，唐代的“窠”、北宋的“稀花团窠”与南宋以后的“团花”，是否为一脉相承的服饰纹样尚无定论，宋元文献中的“团花”与明清的“团花”是否一致也难以考证。但“团窠”与“团花”作为唐宋时期服饰上的圆形纹样是确凿无疑的。



1



2



3



4

图三// 壁画中的圆形纹样

1.莫高窟第158窟中唐各族王子图 2.莫高窟第98窟五代各国王子图 3.莫高窟第198窟晚唐侍从像 4.榆林窟第19窟曹延禄像

二、团花纹的定义与内涵

到了近代，考古工作者面对文物上的某类圆形纹样，推想其大概就是文献记载的团花，再结合从明清以来的代代相传的对

团花的认知，自然而然地将“圆圆的花朵”或者花朵、蝴蝶、龙凤等团成的圆形纹样定名为团花，且范围不再局限于纺织品上，而是将金银器、瓷器、铜镜、壁画上出现的相似纹饰都称为团花。

因无明确的古代标准样式可寻，目前学界对团花纹的称谓见仁见智：齐东方认为金银器上的团花是一种圆圆的、似俯视的花朵，与草叶结合的花朵应为折枝花^[16]；韩伟认为花头夹于两叶之间，整体呈圆形的折枝花适合纹样可被称为“折枝团花”，呈扁平形的也可被称为“扁团花”^[17]；冯先铭认为瓷器上的团花是一种圆形适合纹样^[18]。适合纹样不具有连续性，但在纺织品上出现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的圆形纹样也可被称为团花纹，这与瓷器构图面积小、多做适合纹样有关，所以目前学界对团花纹的定义并未达成共识。

综合目前考古资料中被命名成团花纹的纹饰特征，可以归纳出团花纹是一种圆形花朵或多元素聚合成圆的纹样，有狭义团花纹、广义团花纹之分。团花纹常做适合纹样装饰在瓷碗底心、金银器壁、镜背上，或做二方、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纺织品或壁画上。

狭义团花纹是一种俯视的圆形单独花朵。以花蕊为中心，“花瓣”向四周铺开，呈现对称或放射状，花蕊小、花瓣大，花瓣密实、外缘饱满，如宋代青铜镜上的团花纹饰（图四：1）^[19]。但并非所有圆形花朵都会被命名成团花，团花是一种泛称，当一些圆形花朵明显可辨认出品种，如圆形的牡丹花纹，就会以具体的牡丹花命名，不再采用团花这样的泛称。也有一些花朵花瓣不够稠密圆润，花蕊小、花瓣大，很难被称为团花，常用花瓣纹、花卉纹这种更简易的名称。



图四// 团花纹与折枝花

1.宋代铜镜团花纹 2.元代金锦鹦鹉团花纹 3.南宋越窑瓷盖折枝花 4.明万历年间五彩开光碗折枝桃纹
5.南宋越窑青瓷水盂开光团花纹

广义的团花纹是多种元素聚合而成的圆形纹样。不再单纯指花卉图案，而是指“花纹”“花样”，范畴更广阔。且不再强调整体的对称、旋转、放射性，除了花朵和草叶、枝蔓外，还加入飞禽鸟兽、云气等元素，如元代纺织品上的鹦鹉团花纹（图四：2）^[20]。这些元素经过创作者主观的组合加工设计，聚合成圆形，花卉、枝蔓、鸟兽、祥云不再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形态。

不是所有圆形花纹都能被称为团花纹^[21]，广义团花纹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文含义，即不受圆形器体或圆形边框本身的制约。一些铺满器盖、盘底的折枝花纹饰，或者在圆形开光内绘制成花卉自然生长状态的纹饰，虽然整体是圆形花纹，但也不属于团花。如南宋越窑岑家山窑址出土的青釉瓷盖（Y20：64）上的圆形图案，受盖子圆形外轮廓限制，整个图案为圆形，人们只会将这类圆形花卉图案定名为“折枝花”，而不会称它为团花（图四：3）^[22]。又如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五彩开光折枝桃纹碗，这类纹饰大多被称为“写生花”“折枝花”（图四：4）^[23]。

究其原因是学界在长期的命名实践中对团花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概念，即“团”除了有“圆”的意思外，还有“聚合”的含义^[24]。创作者在设计纹饰时，将花卉、枝蔓、飞禽走兽等元素进行组合，主观能动地将它们聚合成圆形图案，形成了现在人们观念上的团花。一些覆盖在圆形器盖、盘底、碗底、铜镜上的圆形纹样之所以未被称为团花，是因为它本身受器形载体所限，被迫呈现出圆形，而不是创作者主动将它们聚合成圆形。一些圆形开光内的写生花图案，只是将表现植物自然生长的图案绘制在圆形框里，并不是将各类元素重组加工聚合成圆形，所以也不会被命名成团花。

但狭义团花纹不受器形限制，即使覆盖分布在圆形器物上也还是团花，因为它本身就是圆形，不存在被器物外轮廓限制的原因，如越窑岑家山窑址出土的青瓷水盂（Y20(2)：39）外壁开光中的团花，即使没有圆形开光，花朵本身也还是圆形，所以仍被称为团花纹（图四：5）^[25]。

团花纹是我国的传统纹样，早在二里头时期，陶器壁就已经出现狭义团花装饰（图五：1）^[26]。战国时期也有错金银团花纹流鼎（图五：2）^[27]。唐朝时期，色彩艳丽的狭义团花纹被广泛运用到纺织品上，此时瓷器的审美更注重瓷器本身的釉质釉色，胎装饰工艺还在起步阶段，罗湖窑、寿州窑有少量的团花纹装饰，晚唐五代黄堡窑、越窑开始出现狭义团花纹瓷器。宋元时期纺织品出现团龙、团凤等广义团花纹，此时耀州窑、磁州窑等釉质一般的窑口转而发展刻划装饰工艺，开始在瓷器上频繁装饰狭义团花纹样，北方以团菊纹为主，南方越窑的团花纹与唐代金银器上的团花十分相似。到了明清时期，广义团花纹在纺织品上的运用更为频繁，团蝶、团云、团寿样式更为丰富，团龙团凤纹甚至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礼服纹饰。随着瓷器彩绘工艺的发展，明清瓷器上的团花纹不再局限于狭义团花纹，广义团花纹被绘制在瓷器外壁上，如四川省成都市永丰肖家村明墓出土的明嘉靖年间青花团龙纹碗（图六：1）^[28]，狭义团花纹也创新演变成皮球花（图六：2）^[29]，跳脱出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纹样等传统构图方式，随意错落叠加在瓷器器壁，显得分外活泼灵动。



图五// 早期团花纹

1.二里头遗址团花纹陶片 2.战国错金银团花流鼎



图六// 广义团花纹与皮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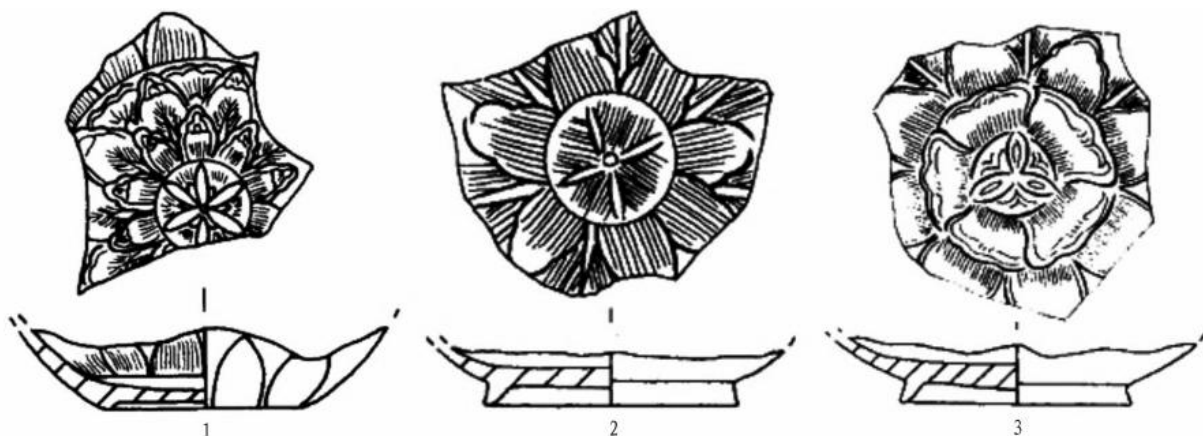
1.明嘉靖青花团龙纹碗 2.清雍正斗彩皮球花罐

“团”是“圆形”的含义，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深入人心，凡事追求圆满。古人喜爱轮廓饱满的圆形，圆形设计不带棱角，柔和典雅，符合中庸之道，如通过满月寄托思念、吃圆形的月饼。且“团”也是动词“聚合”，如吴均曾写道：“桂皎月而常团。”“团圆”“团结”“团聚”等美好词汇均有“聚合”这一动词含义。团花就是将各类象征吉祥的物像元素“聚合”成“圆”。这些主题元素一般均具备美好的含义，如牡丹代表富贵、菊花代表高洁与长寿，团龙、团凤代表高贵和吉祥，团蝶代表美丽等。所以团花的内涵除了包括主题元素本身的美好寓意外，更重要的是表达出中国人对“圆”代表的圆满、幸福、和谐的憧憬。从隋唐至明清，中国人的思想与审美发生了巨大转变，具体可以体现在流行纹饰的变化，而团花纹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发流行，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对团圆美满的向往从未停歇吧。

三、南方地区出土宋元时期瓷器的团花纹饰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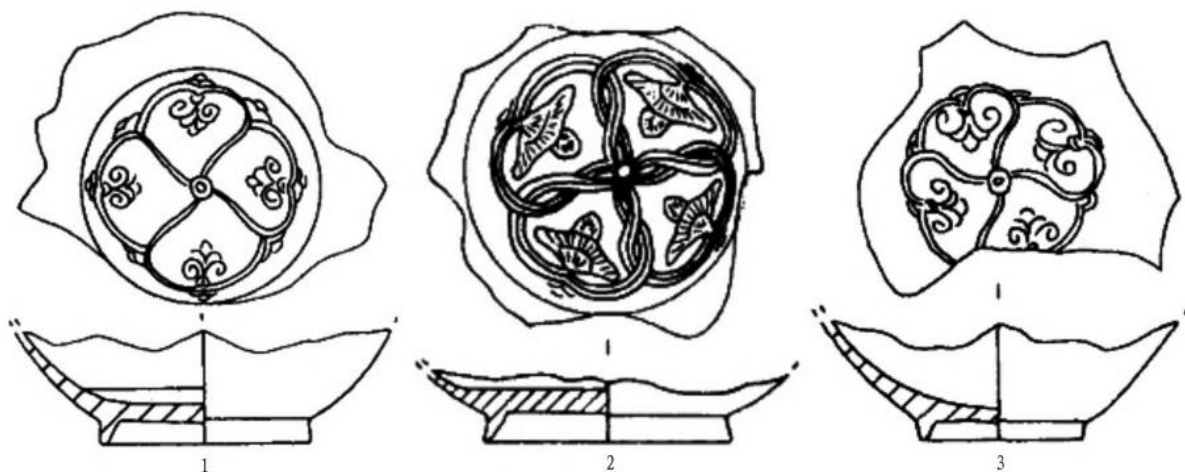
团花纹是宋元时期在瓷器上广泛使用的纹饰，南方生产带有团花纹瓷器的窑址大致分布在浙江、福建、广西、湖南、四川、江西等地。不少窑址瓷器上的团花纹样式相近，也有窑址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依据花瓣形态、装饰工艺不同，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瓷器上的团花纹饰大致可分为五类。

A类，仿唐代金银器团花，花瓣上下多重叠压，部分中部装饰“十”字形或五星形。此类团花样式集中于越窑（图七）^[30]，与唐代金银器上的团花纹饰非常相似，也与越窑兴盛于唐代有莫大关系，即使到了北宋时期，越窑的装饰风格依然保持着唐代特征。该纹饰流行于北宋时期，温州西山窑、慈溪上林湖越窑均有发现，湖南松溪窑、江西赣州木子岭窑偶有发现，南宋时期随着越窑衰败而消失。



图七// 宋元时期南方瓷器上A类团花纹

1.北宋上林湖越窑瓷器(上Y41:93) 2.北宋上林湖越窑瓷器(上Y21:8) 3.北宋上林湖越窑瓷器(上Y4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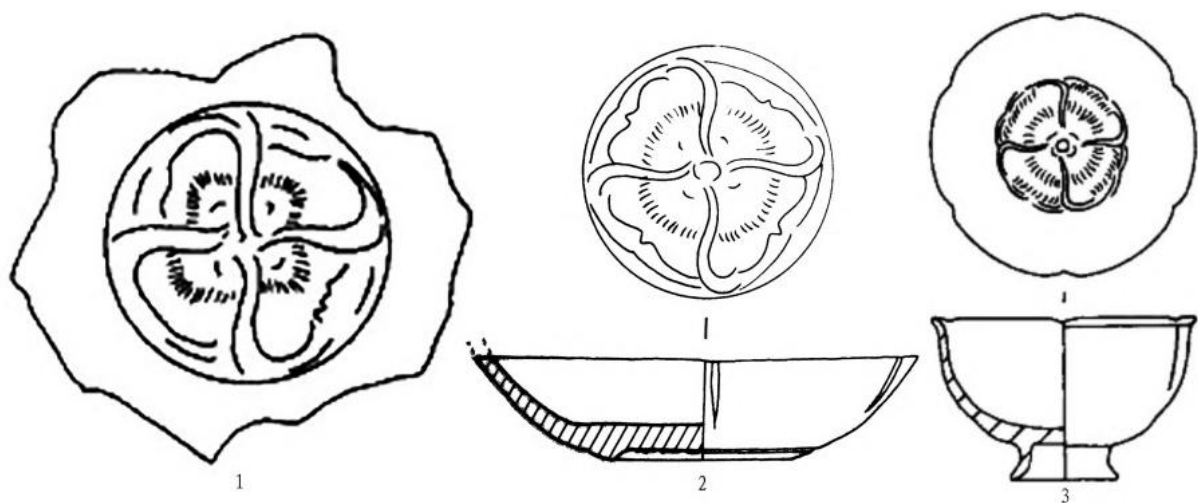


图八// 宋元时期南方瓷器上B类I式团花纹

1.北宋古银锭湖越窑瓷碗(彭Y6:6) 2.北宋前期上林湖越窑青釉瓷(上Y21:6) 3.北宋早期上林湖越窑瓷碗(上Y41:21)

I式，团花线条用绶带勾勒而成，一般为四瓣，因大部分花瓣边沿向内对卷成忍冬花纹，笔者曾将该类团花称为“仿忍冬纹团花”，但就目前收集的资料看，还有对卷成荷花的样式（图八）^[31]。此类团花样式同样集中于越窑，浙江上虞窑寺前、慈溪上林湖、古银锭湖均有发现。此类团花五代时期就已出现，北宋中晚期数量减少。绶带纹、忍冬纹都是唐代流行纹饰，带有唐代遗风。

II式，团花只是用简单的线条勾勒，不再使用绶带样式，只是在花瓣边沿处向内凹折，不再对卷成忍冬花或荷花，花瓣均匀分布成四瓣且旋转幅度小（图九）^[32]。五代时期由I式简化成II式，但数量较少，见于慈溪上林湖Y26，此时北方的耀州窑也出现了类似的团花纹饰。到北宋中晚期，温州西山窑、慈溪上林湖等地出现的数量增多，随着越窑衰败，南宋基本不见，但同一时期北方金代的井陉窑曾发现过此类团花的印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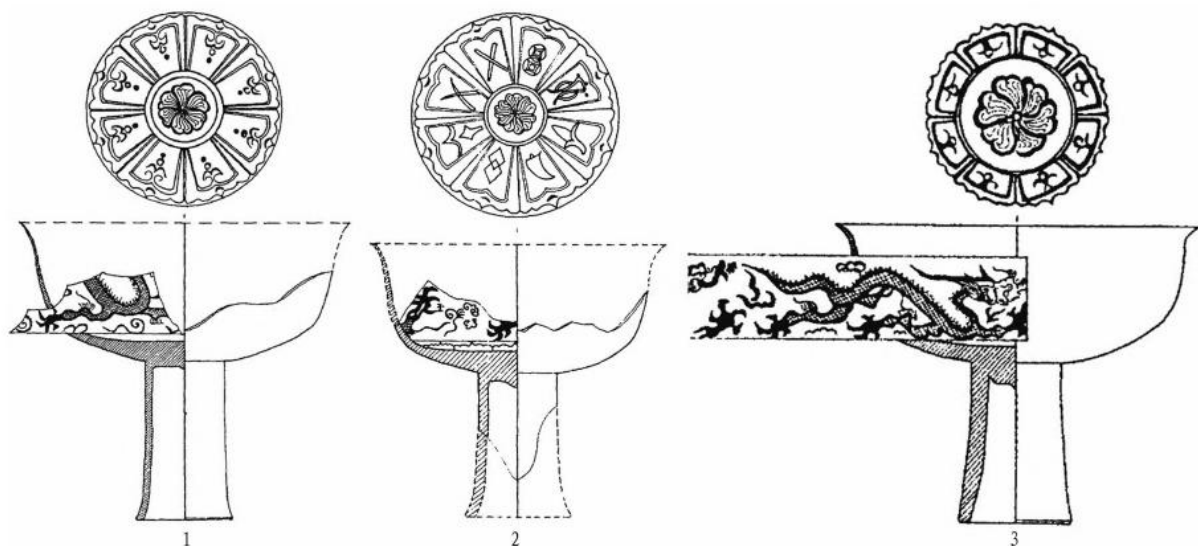
图九// 宋元时期南方瓷器上B类Ⅱ式团花纹

1.北宋古银镜湖越窑瓷器残片(彭Y26:4) 2.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岑家山越窑青瓷盘(Y20②:19)

3.北宋上林湖越窑瓷碗(上Y43:18)

有考古报告将此类纹饰称为“荷花纹”^[33]；扬之水先生认为这类花朵是仿照现实中锦葵科蜀葵塑造的，也就是我们常食用的秋葵，这类纹饰也经常装饰在宋代金银酒盏中^[34]。

Ⅲ式，花瓣数量增多，每瓣花瓣不再均匀分布，且旋转幅度增大（图一〇）^[35]。报告中将此类纹饰称为“栀子花纹”，但就外貌特征看，很难判断此类团花品种。元代湖田窑出现过此类团花纹，装饰在高足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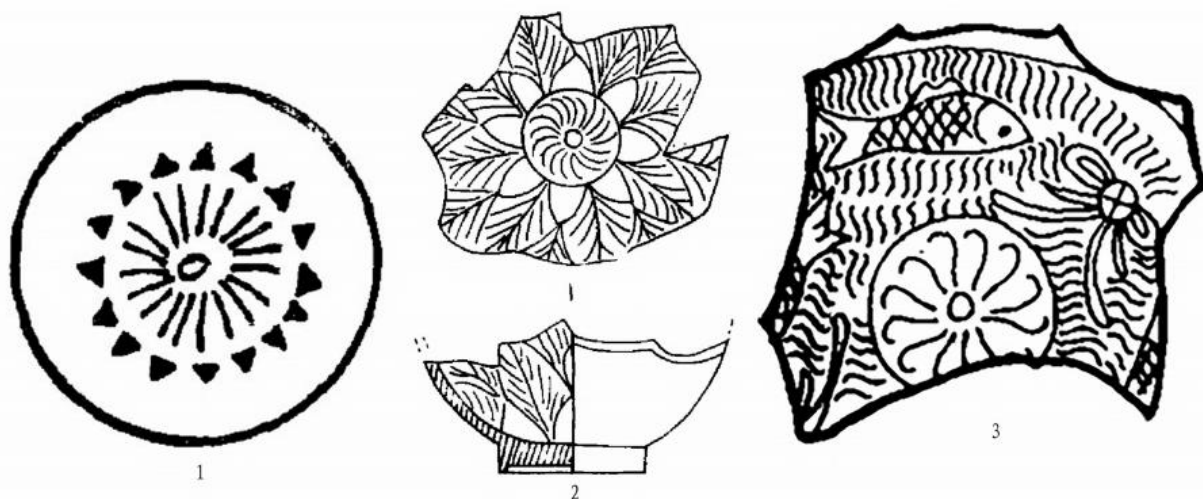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元代B类Ⅲ式团花纹

1.湖田刘家坞窑址高足杯(99HL③:02) 2.湖田刘家坞窑址高足杯(99HL③:03) 3.湖田刘家坞窑址高足杯(99HL③:11)

C类，团菊纹，是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黄堡窑开创的装饰纹饰，起初为潦草的线形，北宋时期耀州窑发展成了规整的团菊，风靡南北方。按照花瓣的形态不同，可以分为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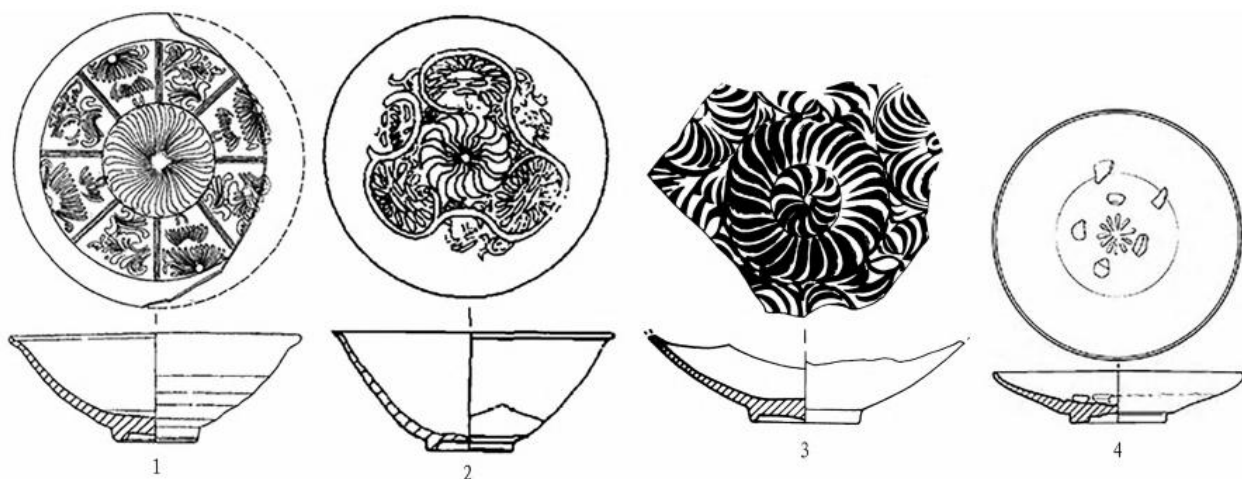
I式，形似菊花，花瓣呈线状，朝一个方向弯曲旋转（图一一）^[36]。五代北宋前期浙江越窑开始出现，温州石头面山窑、浙江武义小窑、上虞窑帐子山均有发现。北宋中期至南宋时期，湖南地区开始流行，营田窑、松溪窑、郴州资兴送塘窑均有发现。南宋时期福建赤土窑、湖南营田窑有出土。



图一一// 宋元时期南方瓷器上C类I式团花纹

1.南宋至元福建漳浦县赤土窑瓷器 2.北宋江西赣州木子岭窑擂钵(T1①:11) 3.南宋湖南营田窑瓷器残片

II式，规整的团菊纹，呈长条水滴状，花瓣稠密（图一二）^[37]。北宋中晚期，四川磁峰窑，湖南鹿角窑、营田窑和烟口窑，广西永福窑和中和窑等多地均有发现。南宋时期，福建后壁山窑、湖南衡山窑、浙江越窑低岭头等地亦有发现，但数量开始减少。到了元代，贵州天柱县瓦罐滩、湖南青冲窑发现的团菊纹已然十分潦草，走向衰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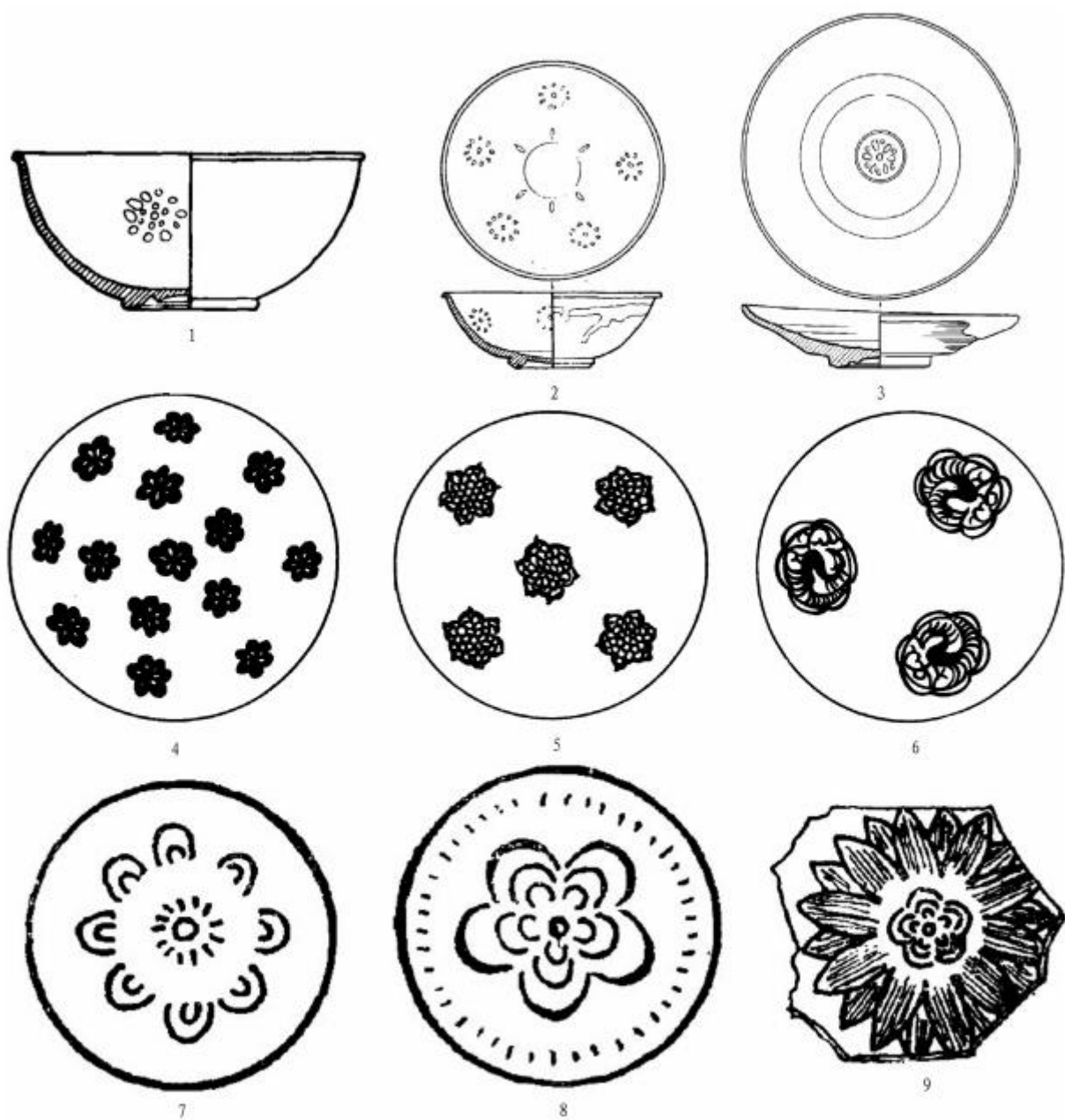
图一二// 宋元时期南方瓷器上C类Ⅱ式团花纹

- 1.北宋中晚期永福窑瓷碗(H76:7) 2.北宋晚期湖南烟口窑瓷碗(T1④:44) 3.南宋早期低岭头越窑青瓷盏(Y13:5)
4.元代贵州天柱县瓦罐滩窑(T6⑦:410)

D类, 该类团花为圆圈点状, 装饰在瓷器内外壁或碗底中心(图一三:1—3)^[38]。

E类, 为吉州窑特有的剪纸贴花团花(图一三:4—6)^[39]。

F类, 花瓣呈半圆形, 不闭合, 为一至四层不等, 似莲花的简易变形(图一三:7—9)^[40]。南宋时期出现于福建赤土窑。



图一三// 宋元时期南方瓷器上D、E、F类团花纹

1.北宋湖南岳阳鹿角窑瓷碗 2.宋元湖南衡山窑瓷碗 3.元代贵州天柱县瓦罐滩窑(G3:134) 4—6.南宋吉州窑剪纸贴花瓷纹饰
7—9.南宋至元福建漳浦县赤土窑瓷器

通过上述例证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南方各窑址装饰的团花纹一般采用刻花划印花工艺，吉州窑则采用特色的剪纸贴花工艺。团花纹常在碗、盏、碟、盘类瓷器内壁中心的做适合纹样；少数可见碗外壁上装饰团花纹，但数量有限；吉州窑剪纸贴花瓷器则会在碗内壁或花瓶外壁装饰团花纹。

在碗盏中心装饰的原因：一是部分窑址工艺技术有限，团花纹只需刻划一朵花，工艺相对简单，或用模范模印时碗底位置

印纹较易清晰，所以在此装饰，不少窑址都出土中心带有团花纹的模范；二是碗盏是百姓生活中最常用的瓷器，吃饭饮水时，碗中心一朵小团花若隐若现，十分富有情趣。元朝流行高足杯后，高足杯内壁中心也常装饰一朵小团花，低头饮酒时可见杯底的团花在酒水中荡漾，格外浪漫。

四、宋元时期南方地区瓷器的团花纹饰分期

宋元时期南方团花纹饰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期。

第一期：五代至北宋初期，即朱温灭唐称帝（907年）至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这一时期主要流行越窑的A类花瓣多重叠压的团花以及B类Ⅰ式绶带四扇团花；B类Ⅱ式简易式四扇团花已经出现，但数量较少；越窑开始出现C类Ⅰ式线形团菊纹。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生产团花纹瓷器的窑址主要集中在越窑，越窑仍是南方瓷器的中心。越窑一方面保持着唐代盛烧期的装饰特色，继续沿用唐式风格的团花纹饰；另一方面也开始与北方黄堡窑交流，引入了北方特色的线形团菊纹。

第二期：北宋中期及晚期，即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至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这一时期主要流行A类花瓣多重叠压的团花，越窑的B类Ⅰ式绶带四扇团花数量减少，B类Ⅱ式简易式四扇团花数量增多。湖南地区流行C类Ⅰ式线性团菊纹，四川、湖南、广西、福建等地流行C类Ⅱ式规整的团菊纹。

这一时期越窑B类四扇团花Ⅰ式减少、Ⅱ式增多，可以看出社会审美由复杂华丽的唐式转变为简洁素雅的宋式。北方耀州窑团菊纹同一时间开始在南北方多地流行，统一的政权使南北方瓷文化交流极为密切。

第三期：南宋时期（1127—1279年）。这一时期主要流行E类吉州窑剪纸团花，湖南、福建等地出土有C类Ⅰ式、Ⅱ式团菊纹，福建赤土窑出土了F类花瓣半圆形类似莲花的团花纹。

这一时期北方被金国占领，团菊纹在北方除山西部分窑址发现外，在耀州窑、磁州窑内均已消失；南方发现的数量也有所下降，湖南衡山窑延续了团菊纹最后的余晖，整体迎来衰落期。此时吉州窑创新出了极具民俗特色的剪纸贴花团花，福建赤土窑发现的花瓣半圆形类似莲花的团花与北方耀州立地坡窑址出土的纹饰极为相似，这或许与北方工匠南迁有很大关系。

第四期：元代时期，即至元十六年（1279年）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湖田窑高足杯中出现了B类Ⅲ式团花。贵州、湖南出现的团菊纹样式非常简单潦草。

这一时期，随着青花彩绘工艺发展，瓷器上开始绘制复杂的图案，团菊纹彻底衰败，样式简单的团花纹作为胎装饰纹样不再是瓷器的主流纹饰。

除了以上比较流行的团花纹外，D类点状团花纹较为简单，从宋至元均有，但数量都不多，此类点状团成的团花纹在北方耀州立地坡窑址、磁州窑乃至辽、西夏少数民族瓷器上均有发现。

五、总结

团花纹作为一种圆形纹样，有狭义广义之分，其蕴含团圆美满的深意从古到今深受人们喜爱，被广泛装饰在纺织品、瓷器上。宋元时期随着刻花印花工艺的发展，瓷器上折枝花、缠枝花等纹饰竞相纷呈，但轻巧可爱的团花纹一直占据着碗盏类器物的中心位置。五代时期北方黄堡窑出现简易团菊纹饰，南方越窑出现富有唐风的团花装饰。到了北宋中晚期，宋人的日常生活相比唐代更加世俗化，审美日益趋向含蓄典雅，崇尚简易自然。越窑日渐衰落，耀州窑打破以往釉色审美，以胎装饰见长，清秀素雅的刻划花纹符合宋人审美，也易于其他小窑模仿，其代表性纹饰团菊纹风靡全国。不过此时南北方团菊纹还有一定差异，

北方团菊纹更稠密规整，而南方团菊纹常出现花瓣分离、花瓣尾带弯钩的样式。南宋时期随着北方工匠南迁，创新出了吉州窑剪纸团花纹，南北也有一定交流。元代团花纹已然衰落，但人们对团花的喜爱历久弥新。明清时期，彩绘工艺发展使得瓷器壁上可以绘制更复杂绚丽的广义团花、团蝶、团龙等纹饰，团花样式较宋元时期有了巨大革新，进入新的发展期。

参考文献

- [1]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六十七《礼乐一》，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684 页。
- [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八十《舆服三》，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2006 页。
- [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七《舆服三》，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646 页。
- [4] 金维诺：《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十三，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第 91 页。
- [5]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1018 页。
- [6]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531 页。
- [7] 同 [6]，第 527 页。
- [8]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二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第 1972 页。
- [9] 元·脱脱撰：《宋史》卷一五三，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3575 页。
- [10] 赵丰：《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文物》 2010 年第 3 期。
- [11] 吴山编著：《中国纹样全集》（宋元明清卷），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 年，第 149 页。
- [12] a.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7》（中唐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第 59 页；
b.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9》（五代宋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第 9 页。
- [13]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8》（晚唐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第 178 页。
- [14] 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 2012 年，第 41 页。
- [15] 同 [11]，第 145 页。
- [16]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44、145 页。
- [17]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 1989 年，第 24 页。
- [18]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第 255 页。

-
- [19] 张道一主编：《中国图案大系 4》（两宋元明卷），山东美 术出版社 1993 年，第 143 页。
- [20] 同 [19]，第 388 页。
- [21] 夏目晶子：《从形式的角度看中国“团花”纹样的民族 文化内涵》，《艺术探索》2006 年第 4 期。
- [22] 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15》（陕西卷），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121 页。
- [23] 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2》（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卷），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221 页。
- [24] 王力、岑麒祥、林焘：《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 4 版，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第 386 页。
-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慈溪南宋越窑 2010—2018 年调查发掘报告》，文 物出版社 2019 年，第 285 页。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1959~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第 96 页。
- [27] 洛阳博物馆馆藏文物。
- [28] 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10》（广东广西海南等卷），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168 页。
- [29] 成龙：《雍正斗彩皮球花纹罐》，《紫禁城》1987 年第 6 期。
- [30] 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70、78、100 页。
- [31] 同 [30]，第 67、100、138 页。
- [32] a. 同 [30]，第 82、144 页；b. 同 [25]，第 280 页。
- [33] 同 [25]，第 278 页。
- [34] 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三），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44、45 页。
- [35] 肖发标、徐长青、李放：《湖田刘家坞“枢府窑”清理报告》，《南方文物》2001 年第 2 期。
- [36] a. 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赣州市博物馆：《江西赣州七里镇木子岭窑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2 年第 1 期；b. 周世荣、张中一、盛定国：《湖南古窑址调查之一青瓷》，《考古》1984 年第 10 期；c. 王文径：《漳浦县赤土 古窑福建址调查》，《考古》1993 年第 3 期。
- [37] a.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永福县博物馆：《广西永福县窑田岭区宋代窑址 2010 年 发掘简报》，《考古》2014 年第 2 期；b.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宋代烟口窑址的发掘》，《考古》2006 年第 11 期；c. 同 [30]，第 214 页；d. 四川大学考古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柱县文物管理所：《贵州天柱县瓦罐滩元代瓷窑址发

掘简报》，《考古》2016 年第 3 期。

[38] a. 同 [36] b；b. 周世荣、郑均生：《湖南古窑址调查之二彩瓷》，《考古》1985 年第 3 期；c. 同 [37] d。

[39] 刘品三：《吉州窑瓷器的剪纸纹样》，《南方文物》1997 年第 2 期。

[40] 同 [36] c。